



學海一牛鳴

錢仲聯
著



屈 辭 體 研 究

黃鳳显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90012654



學海一牛鳴
錢仲肥
著

屈 辞 体 研 究

黄凤显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辞体研究/黄凤显著.—2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6

(学海—牛鸣)

ISBN 7-5438-1515-X

I. 屈... II. 黄... III. 楚辞—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187 号

责任编辑:胡如虹

装帧设计:陈 新

屈 辞 体 研 究

黄凤显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2002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40,000

ISBN7-5438-1515-X

1·182 定价:17.00 元

编者的话

《学海一牛鸣》是一套学术著作丛书，专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空前活跃，并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古为今用，更快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套丛书旨在为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学术园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与繁荣。我们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数年的努力，出好这套丛书。

“一牛鸣”除字面一般意义以外，又为“一牛吼地”^{*}之简称，指牛鸣所及的距离。这套丛书兼取二者之义，凡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即犹如牛之一鸣，其声宏亮，必然飞震林樾，闻于远处。学海茫茫，添一新作，又说明著述者已向前跨越一新的里程。

蒙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为丛书题签，谨此致谢。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一牛吼地，梵语长度单位“拘卢舍”的意译。《大唐西域记》卷第二《印度总述·数量》：“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

序 言

屈辞，是两千多年以前，产生于我国南楚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是伟大诗人屈原的天才创造。凡接触过它的人，无不为其思想之深邃，感情之激越，以及其艺术风采之非凡超绝所惊异。真所谓“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语），“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语）。

正是如此，屈辞一直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自汉及今，成为“显学”。但涉足这一领域也有相当的难度，记得一位中青年学者在其论著开篇中，曾说了这样的话：“楚辞的世界，博大精深；楚辞的世界，色彩斑斓；楚辞的世界，令人神往；但是，要走进这个‘世界’竟如此的困难。由于时代的隔阂，事实的幽昧，文句的艰奥，词旨的婉曲，导致了疑义纷纭，久讼莫断。或囿于旧说，难脱藩篱；或游谈臆说，羞无实据；或治丝愈紊，遂成死结。”（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这话，生动地形容了楚辞的伟大成就和吸引力，同时也道出了楚辞学的某些现状和治楚辞的不易。

这些年来，在我接触的青年学子中，对于涉足楚辞往往有种犹豫心态，既以为楚辞很有吸引力，但又觉得关于楚辞的文章，似乎已被前人做完，已难有所新意。诚然，今日治楚辞并真正有所开拓，实为不易。但也正像学术上所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一样，对楚辞的探索和研究，是不会、也不可能无止境的。这正如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曾说过的那样：“真正优秀的作品，无论怎样探

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他还说：“我们常常发现，任何值得思考的问题，已无不被前人思考过了，而我们的任务，不过是再思考而已。”因此，像屈辞这样伟大、优秀的艺术，自是人类美善精神的无尽藏，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而科学研究，就是要由已知，探索未知，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前人已获得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再思考，再认识。治学无疑就像长跑中的接力赛，前人所到达的止点，应该正是后人的起点。正因为如此，学术的发展，乃一代代薪火相传，永无止境。当然，这需要有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充分掌握和认真的态度，更需要有勇于探索、勇于开拓的精神。

黄生风显，生于南国，熟谙楚俗、楚文化，热爱楚辞。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硕士生，毕业后从教数年，继续攻读博士生。其先后学位论文，皆选楚辞为课题。这部《屈辞体研究》作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曾经诸多专家评议，颇得好评。

近日，黄生来说，论文经友人推荐，将付梓，求为序。我想，风显同志的这篇论文，确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其一，作者选取屈辞的文体作为切入点，将屈辞分为体裁、语体和风格三个层面进行剖析。我们知道，看一个诗人、作家，是否能够做到“体由独创，语出新裁”，乃是衡量其艺术上的贡献和成就大小的重要尺度。作者正是从研究屈辞体出发，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诗人屈原的天才创造和伟大成就。这一角度和方法，是可取的，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其二，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少新见。如屈辞的出现，除从诗体嬗变的角度分析外，还强调和分析了屈原在独特的思想感情和文化素养之下的主观选择性，这无疑更能科学地说明屈辞的创造性和不可重复的特征。在论述屈辞的出现和创新时，作者从五个方面详加剖析和论证，这是前人所未及的。另外，作者从屈辞的意象、意境的组合来探讨屈辞风格的基本特征

等，均颇具深度和颇有创见。论文的独到之处尚多，无需赘缕，读者自会有所见。

最后，我想谈谈我对当前楚辞研究的一点感想。学术研究不能只囿于旧说，而贵在求新，但近年来有的治楚辞者，在“求新”上却又不无可议。如我前面已说到，楚辞一直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热点，但也是个难点。难就难在时代久远，资料不足，不少地方需要考证，甚至推测。但这不等于为随意性开了方便之门。我的意见是，越是资料不足，持论越要慎重，论证力求严谨。其次，楚辞学的研究，需要借助于相邻学科的发展并吸取其成果。当前有一些学者，结合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对楚辞做新的探求，并作出了一定成绩；还有的人引进某些新学理、新概念，试图刷新楚辞学面貌。这些尝试都是有益的。但我觉得也应该注意，结合某一学科来研究楚辞，不能流而不返，我们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楚辞”，其最终目的是要有助于对楚辞文本的理解和评价。至于运用某些新理论，也要审视是否科学，是否结合得上，切忌生搬硬套。我想，创新而不离求实，博取而能有约，也许对当前楚辞学的正常发展是极需要的。有鉴于此，我觉得凤显同志的这篇论文，既运用了古文论和现代学术的某些观点，又能结合学科实际，谨严治学，在治学学风上是可取的，值得提倡的。

凤显同志，勤奋好学，视野开阔，善于思考，勇于求新。余忝为其师，滋兰树蕙，亟愿其峻茂有成。但学无坦途，作为一位青年学者，任重而道远，谨愿他再接再厉，不断进取，能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

褚斌杰

1997年春于北大畅春园

目 录

引 言

- 一、关于屈原辞…………… (1)
- 二、“楚辞”、“骚体”与屈辞体…………… (4)

第一章 屈辞的抒情诗属性

- 一、屈辞抒情诗体的由来…………… (12)
 - (一) 诗歌抒情的源起及抒情诗的出现…………… (12)
 - (二) 屈原对抒情诗的选择…………… (18)
- 二、屈辞抒情性及其表现…………… (23)
 - (一) 屈辞之抒情诗分类…………… (23)
 - (二) 屈辞的抒情方法…………… (39)
 - (三) 屈辞抒情诗的主要特点…………… (46)

第二章 屈辞语言

- 一、战国时代一种崭新的诗歌语言…………… (50)
- 二、夏言与楚语…………… (53)
 - (一) 屈辞与夏言…………… (54)
 - (二) 屈辞与楚语…………… (65)
- 三、语汇及文辞…………… (79)
 - (一) 对语词的求新求异…………… (81)
 - (二) 对语词的多方藻饰…………… (84)
 - (三) 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89)
- 四、句式…………… (110)
 - (一) 对四言句式的突破…………… (110)

(二) 整散有致而参差错落	(120)
(三) 句法功能的内部调整	(122)
五、节奏与韵律	(126)
(一) 节奏	(127)
(二) 韵律	(132)

第三章 屈辞意象

一、意象与屈辞诗体	(138)
二、屈辞的意象创造与意象组合	(141)
(一) 屈辞的意象创造	(141)
(二) 屈辞的意象组合	(146)
三、屈辞意象类型分析	(149)
(一) 人事意象	(150)
(二) 自然物意象	(154)
(三) 神话意象	(160)
四、屈辞意象的艺术隐喻和象征	(164)
(一) 隐喻	(164)
(二) 象征	(168)

第四章 屈辞结构

一、屈辞的意境构成	(172)
二、屈辞的篇章结构	(184)

第五章 屈辞风格

一、屈辞的诗体与诗风	(195)
二、屈辞风格的基本特征	(200)

附录	(208)
----------	-------

1. 《国殇》一诗与《九歌》诸问题·····	(208)
2. 楚神话与楚辞(骚型)艺术·····	(221)
3. 楚地域环境与楚辞文学·····	(240)
4. 20 世纪楚辞研究综述·····	(253)
 主要参考书目·····	 (295)
 后 记·····	 (302)
 再版后记·····	 (304)

引言

一、关于屈原辞

屈原辞，是指战国晚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所创作的诗歌作品。

最早为屈原作传的司马迁，在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首次提到了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作品。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言屈作为25篇，具体篇名未列。东汉王逸据刘向辑本作《楚辞章句》，属屈原名下的作品计有：《离骚》、《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11篇）、《天问》、《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远游》、《渔父》、《卜居》，还有一篇《大招》，其作者王氏疑不能明。加上司马迁认定为屈作、王逸认为是宋玉作的《招魂》一篇，屈原作品或可能为屈原作品的篇数总共27篇。

对屈原作品的认定，汉代人已看法不一。除了史迁言之凿凿的《招魂》而王逸属之宋玉外，出自刘向《七略》的班《志》与同出自刘向辑本的王逸《章句》，所计屈作篇数也相差一篇。悬案难决，屈原作品有些篇什的真伪遂成历代的学术争论问题。其中，《招魂》、《大招》、《远游》、《卜居》、《渔父》五篇是最有争议的作品。对此，我们应该略加辨析。

《招魂》一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赞语中说：“余读

《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楚辞章句》却谓：“《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王逸的说法流布了一千多年，至明末黄文焕《楚辞听直》始予翻案。黄文焕认定《招魂》和《大招》均为屈作，其后林云铭的《楚辞灯》、吴世尚的《楚辞疏》、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王萌的《楚辞评注》等也都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近代的梁启超，今人郭沫若、姜亮夫等也持此意见，游国恩先生就认为“应该把《招魂》的著作权利判还屈原”^①。所以，尽管异议尚存，但《招魂》为屈作的看法已比较一致。

《大招》是否屈作的争议更大。王逸作《章句》时，该篇作者已不能确指。他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迄至宋代，遂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为晁补之《重编楚辞》和姚宽《西溪丛话》，倾向于《大招》为屈原之作；二是朱熹《楚辞集注》断定其为景差之作。此后，或肯定、或否定，两说一直并存。到现当代，像郭沫若、游国恩等著名学者虽不同意《大招》为景差之作，但也否定它是屈原的作品。不过，认为它是屈作的人也不少。明代黄文焕之后，清代林云铭列举了多方面理由力主《大招》为屈作，吴世尚、蒋骥以及陈本礼的《屈辞精义》一并赞同林说。姜亮夫先生说：“在没有取得更有力的证据以前，我们认为王逸和屈原的时代相距不远，从作品所包含的实际内容来看，还是倾向保留旧说比较妥当。先看王逸的注释：他虽然提出‘或曰景差’的说法，但从他注释全诗的倾向来看，他认为是屈原之作。后人多从文章风格立论说它不是屈原的作品，证据是不够充分的。”^②这个看法是较为妥当的。

《远游》的作者，王逸认为是屈原，向无异议。自清代胡浚

^① 游国恩《屈原》，第54页。

^② 姜亮夫、姜昆武《屈原与楚辞》，第76页。

源《楚辞新注求确》认为该篇系汉人之作后，始有争论。例如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认为是后人仿《大人赋》的伪托之作，胡适《读楚辞》谓仿《离骚》之作，陆侃如《屈原》谓为东汉人伪托，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指为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等。游国恩先生在《楚辞概论》中先是否定《远游》为屈作，但后来又说：“曩辨《远游》非屈作，未审。”^①姜亮夫先生则一再坚持《远游》为屈作，除了在有关著作中多次论及外，并另有专文，从思想内容、文风、语法、音韵诸角度论证本篇为屈原作品，是能令人信服的。^②

《卜居》和《渔父》，王逸认为都是屈原作，但又言《渔父》篇乃“屈原放逐……而渔父避世隐身……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③于是引出后来的纠纷。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以两篇语义肤浅，疑非屈作；清人崔述在《考古续说·观书余论》中定其为伪作。今人陆侃如、游国恩、郭沫若、郑振铎等也是或怀疑或否定。但是，主张二篇作者为屈原的学者亦大有人在。其中，陈子展先生的《〈卜居〉、〈渔父〉是否屈原所作》一文，从多方面论证了两篇作品并为屈作的意见，根据也是比较充分的。^④

上述五篇作品，既存争议，争执各方也就各持其理由，在此亦难作断决。不过，5篇作品都是在汉代就有人认为是屈原所作的，或史迁，或王逸，虽看法有异，但认定它们为屈作都是“古已有之”的事。在没有十分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不宜断然否定这些作品的屈原著作权。所以，我们仍把它们全部看作屈原的作品，27篇，都是屈作。

① 游国恩《屈赋考源》，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4页。

② 姜亮夫《远游为屈子作品定疑》，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3期。

③ 王逸《楚辞章句》。

④ 陈子展《〈卜居〉、〈渔父〉是否屈原所作》，载《学习月刊》，1962年第6期。

屈原留传下来的这些作品，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异常珍贵的一份遗产。自屈原之后，历代的作家、诗人都从中吸收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和艺术营养，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古今的学者亦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研究屈作，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对屈原和屈原作品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许多学者的研究，已扩大到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甚至神话学、宗教学等等相当广泛的文化领域，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然而，专注于屈作“文体”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书即拟在古今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屈辞体进行较全面的分析探讨。

二、“楚辞”、“骚体”与屈辞体

屈原的作品，在体式上常被人们称为“楚辞体”、“骚体”，另外还有称作“屈赋”者。

“楚辞”之称，始于汉代。《史记·酷吏列传》有“买臣以‘楚辞’与助（庄助）俱幸”语；《汉书·朱买臣传》又谓朱买臣能“说《春秋》，言‘楚辞’”，其《地理志》则言严助（庄助）与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茂，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东汉时，王逸在刘向编校的“楚辞”作品集基础上，作《楚辞章句》，收入屈原、宋玉及汉人的有关作品，是为如今所见的最早“楚辞”专集。由此可知，“楚辞”既用来指称战国时楚地出现的一种新诗体，也指屈原及其后来一些作家用这种新诗体创作的诗作，又指由这些诗作选辑而成的一部诗歌总集。

“骚体”，乃由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而得名，即指以《离骚》表现形式特色作为代表的一种诗体，与所谓“楚辞体”基本相同。其称名始见于六朝，如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谓朱买臣、

司马相如“以骚体制歌”，并另有《辨骚》一篇专论其体；萧统的《文选》中也另列“骚”为一类。后代，人们遂相沿袭，或称“楚辞体”为“骚体”。

另外还有“屈赋”或“骚赋”、“楚赋”之称。《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原“作《怀沙》之赋”，言宋玉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则称“屈原赋二十五篇”。由此，屈原作品称“辞”、称“骚”或称“赋”，又成为后世争论的问题。业师褚斌杰先生指出：“实际上，汉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为‘赋’，把‘楚辞’和‘汉赋’混同起来，是并不恰当的。‘楚辞’是战国时代产生在楚国域内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而‘汉赋’却是适应汉代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半诗半文，或称带韵散文的作品。”^①可见，“屈赋”一类的名称虽属古有，但在辨体上是不够精确的。

据金开诚先生的考辨，“楚辞”之“辞”，当是楚国地方特有的诗体，“楚人称之为‘辞’，以别于《诗三百篇》之‘诗’”，故而“楚辞”名称的由来，“最初无非是汉人在全国已经统一的情况下，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地区（楚）的某种特定诗体（辞）的称呼”^②。“楚”之“辞”按今天的资料来看，屈原无疑是最重要的开创者，而其作品更是集之大成者。故“楚辞”之称虽包含了屈辞，但非专指屈原之“辞”。何况，后世使用“楚辞”这一概念，还包括了屈原之后其他诗人所创作的“辞”作。所以要针对屈原作品（诗作）的体式进行研究，称之为“屈辞体”是较为确切的。金开诚先生在《屈原辞研究》一书中使用“屈原辞”这一概念而不用他称，应是甚为科学的，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至于“骚体”，其源虽专指屈作，但往往有一种不能包容全

①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第53页。

②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第3页。

部屈原诗作之嫌，它令人想到的一般是《离骚》、《九章》诸作的体式，其他像《天问》、“二招”、甚至《九歌》，似不便属之。也有以“骚体”等同于“楚辞”者，则又有“楚辞”称法的不确切弊端。既如此，对屈原诗作体式，本书乃统一称之为“屈辞体”^①。

如上所言，“辞”是指一种诗体，那么，“屈辞”便是指屈原的诗作，“屈辞体”就是指屈原诗体。然而“屈辞”或“屈辞体”并不包括屈原的所有作品。《卜居》和《渔父》两篇在屈原作品中较为特殊，它们的主体部分虽有韵律（王力先生的《楚辞韵读》将其主体部分分韵），但散文化的特征极为明显，学者多以为是从“辞”向“赋”转变之作。故此两篇不能视为诗，至多是类似于今天的散文诗。所以就本书的论题和研究范围而论，我们不把这两篇归入“屈辞”及其“屈辞体”之中。

那么，作为一种经由诗人屈原的创造与弘扬，并成为楚地新兴诗体“楚辞”代表的诗歌样式，屈辞体有哪些主要的特点呢？我们认为，尽管屈辞的具体作品各具体式特色，但它们仍然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特征。

1. 在语词的运用上，它熔夏言与楚语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共同语与地方语相结合的诗歌语言。它沿用夏言，因而决定了屈辞体属于我国古典诗歌体式的最基本的特征和性质。它又以楚语入诗，进而在诗歌声律上吸收了“楚声”的特点，在意象组合和意境创造上摄取了楚地文化的丰富成分，使这种诗体呈现出了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宋人黄伯思曰：

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若些、只、羌、淬、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

^① 本文概称屈原诗作体式为“屈辞体”，至于诸多引文，或称“楚辞”，或称“骚”、“骚体”、“屈赋”等，只能照录，是以说明。

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①

楚语入诗，正是屈辞之所以被称为“楚辞”而不被泛称为“诗”，属归“楚辞”而不同于后世仿“楚辞”之作的最基本原因。

2. 屈辞对《诗经》作品的四言句式及其二字结构进行了“扬弃”，既在个别作品或一些作品的某一部分中继承、保留了四言句式，在众多句子中仍使用二字结构，又于此基础上吸收战国时代的新兴散文句式特点，并借鉴了楚地民歌的句式特点，创造出了一种整散有致、节奏分明而参差错落的杂言句式，使它成为与《诗经》作品、先秦散文和楚地民歌三种句式特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旧形”又具“新貌”的崭新的诗歌句式。

3. 屈原综合考察了原始歌谣、《诗经》作品、楚地民歌和巫歌中语助词“兮”及其“些”、“只”等的使用方法和经验，在其诗句中的不同位置变化运用大量的“兮”字或相关语助词，并吸取散文中虚词运用的方法，以众多的虚词来协调音节，形成了屈辞和谐适美而又起伏回宕的韵律节奏。尤其是“兮”字的使用，使屈辞的诗歌句式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成为屈辞语言形式的重要特征和明显标志。

4. 屈辞的章节仍然保持了四句一章的传统形式，但因意象组合和意境创造的需要，它又不囿于传统的形式，进一步扩大增长其章节，因而体现出一种突破“乐章”、“歌节”的局限而向“诗”的章节发展、靠拢的趋势，其章节的外在形式更自由活泼，而内在意义联系更为紧密，为古体诗的章节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创制了楷模。

5. 至少从章节、段落开始，屈辞诗篇的结构就具备了向长

① 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词序》，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宋本。